

# 1997 年国际政治形势研讨会发言选登

编者按:1997 年 11 月 7 日,我们召开了“1997 年国际政治形势研讨会”,现将与会专家的发言择其精华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 1997 年国际政治形势特点之管见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俞 邃

1997 年国际政治形势基本特点似可归纳为:总体保持缓和势头,冷战思维严重存在,大国关系继续调整,霸权主义屡遭挫败,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矛盾依然复杂多变。围绕北约东扩以及与之相策应的“更新”美日安保条约所引发的矛盾和斗争,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俄日关系的明显改善,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产生巨大国际反响,是今年国际政治生活三个方面的重大事件。

北约东扩第一步得手,美日同盟加强,同时引发多方面矛盾,但改变不了国际总体形势趋缓走向。美国谋求世界“主导地位”得失参半,“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遭到包括盟友在内的普遍反对,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利用“人权问题”反华再次失败,坚持只增加德、日两家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快捷法”遭到许多国家坚决拒绝。中国先后同俄、法联合声明强调世界多极化和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俄与德、法首脑确定每年举行一次三方会晤,意在抵制美国全球霸权主义。

“一超多强”格局框架下,大国之间既互相竞争、制约,又彼此合作、协调。中、美、日、俄以及美、俄、欧首脑频频互访或热线联系,充分表现了大国关系调整新态势。

中美关系几经起伏,现有显著改善。中国对美方针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美国对华政策内核仍是“接触加遏制”,但最近一个时期,接触、合作加强。两国关系主要矛盾方面在美国。江泽民主席成功访美,双方宣布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仍将曲折发展。

俄美关系正在修复。症结在北约东扩,还有战略武

器谈判。北约东扩促使俄加快调整亚太政策,改善同日、中、朝鲜半岛、东盟、南亚各国关系,加强自身的存在和影响,这将使亚太安全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政治、经贸、军事、科技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取得进展。继两年前西段边界协定生效之后,东段勘界工作又取得突破。双方正在努力克服政治与经济相比后者薄弱、中央积极性和地方积极性相比后者欠缺的现象。叶利钦总统即将访华,将推动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俄日关系“达到崭新水平”。出于各自需要,双方都有妥协。俄更多以政治让步换取经济利益,日则付出经济代价谋求政治好处。日对俄战略已从“政经不可分”原则,转变为领土谈判与经济合作“均衡发展”。最近叶利钦与桥本会晤,通过了两国在政治、经济及金融等领域发展合作的计划,并就在 2000 年前签署两国和平条约问题达成共识。“北方领土”问题仍是难点所在。

此外,值得重视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反霸意识增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需求增大;地区安全问题复杂多变,有时旧的热点消失,新的热点又爆发,有时旧的热点过不多久便“死灰复燃”;前苏东地区政局趋于稳定,这是各国经济或快或慢不同程度好转的基本原因之一。

## 1997 年国际政治形势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杨达洲  
美国所研究员

冷战结束六年后的今天,世界上已经形成了以“一超四强”为特征的多元新格局。

今年的国际形势演变表明,左右当今世界的正是这“一超四强”,而不是其他 180 多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在

国际舞台上仍然起着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美国仍然仗恃其实力,霸气十足,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例子之一是北约东扩。北约东扩的矛头是针对俄罗斯的,直接损害其地缘政治利益。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与美平起平坐“两极之一”的国家,只好被迫吞下“东扩”这枚苦果。在“东扩”过程中,在首批吸收哪些国家的问题上,美国对它的盟国也是采取以强凌弱的态度。美主张首批只吸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三国,法意等大多数国家主张同时吸收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但最终的结果是“多数服从少数”,美国的主张获胜。例子之二是美国仍然成功地阻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它的盟国已不反对中国加入。

在这种“一超四强”多元新格局下,今年国际形势的第二个特点是,欧洲越来越以一个声音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相竞争。例子之一是今年 2 月在新加坡成功地举行了首次亚欧会议,10 个亚洲国家和 15 个欧洲国家的首脑撇开美国聚会,主张彼此加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并商定明年在伦敦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例子之二是,今年欧美在经贸问题上的摩擦不断,欧洲由于已经具备与美抗衡的经济实力,欧盟国家的 GNP 已超过美国。对于美国损害别国的蛮横做法,为通过赫-伯法,欧盟针锋相对,提出由世贸组织裁决,最终迫使美国让步。例子之三是在中东问题上,欧洲显得比以往积极,提出“以全面撤军换取全面和平”的新方案,要求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今年国际形势的另一个特点是,俄罗斯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在外交上格外活跃。叶利钦今春在赫尔辛基与克林顿举行了第九次首脑会晤。4 月,俄中两国首脑实现了第五次会晤,不久又与中国签署了 6 个合作文件,叶利钦现在又来华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年,俄与欧洲国家的交往更为密切,德国首相科尔、法国总统希拉克、英国首相布莱尔、意大利总理普罗迪等先后访问莫斯科。上个月俄、法、德三国商定,每年举行一次三方首脑会议以协调立场。俄这些外交行动目的显然在于牵制美国,而欧洲在对抗美国这一点上与俄是有共同语言的。俄继 6 月主动宣布其战略武器不再瞄准日本之后,本月叶利钦又与桥本会晤,商定在 2000 年前双方签署和平条约,给俄日关系正常化以极大的推动。

在“一超四强”多元新格局下,各国间,特别是“一超四强”间解决矛盾、纠纷、冲突的方式,不是采用冷战时期的军事上对抗、政治上对立、经济上封锁等方式,而是更多地采用谈判、对话、妥协、折衷的方式。最近江泽民主席成功地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就是说明这一趋势的最新事例。

## 新的地缘政治形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谌取荣

1991 年苏联解体这一地缘政治大地震发生之后不久,尘埃尚未完全落定,一场新的地缘政治角逐即已悄然展开。1997 年的事态发展使这场角逐进一步表面化,格外引人注目。

这场角逐已经遍及整个欧亚大陆及其边缘地带。如在欧洲,北约决定于 1999 年首批接纳波、匈、捷三国入盟,标志着北约东扩正式启动,美、俄、欧在中东欧、东南欧和全欧洲的竞争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亚太,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更新军事同盟关系,激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棋局”。中俄等努力推进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中国和东盟谋求建立睦邻信任伙伴关系,日俄打算在 2000 年前签订和平条约,美中就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东盟还邀请中、日、韩举行首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在中亚一带,美国越俎代庖,提出所谓“中亚和高加索通向未来的路线图”,企图全面插足这一“地缘政治要冲”;日本推出了“欧亚大陆外交”构想,试图从“边缘地带”进入“心脏地带”;此外,美欧俄等还在该地区举行了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新的角逐几乎将各大力量都卷了进去,但是不同力量有着不同的处境和心态。美国的动向使人想起当年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北半球合作带”设想,更使人联想到布热津斯基近来提出的建立“横贯欧亚大陆的安全体系”的“欧亚地缘战略”。俄罗斯在其西部和南部的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下,退中求进,试图通过重铸独联体“地缘政治板块”,与法德等西欧大国建立“新的地缘政治中心”,同中国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增强抗衡一超主宰世界的力量。德国有意乘北约东扩之势扩大其在欧洲的影响,法国则更加关注南欧、中东和非洲。日本极欲“借船出海”,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发挥政治大国作用和“实现能源供给地的分散化”。

全球地缘战略态势似乎仍在向美国或西方倾斜。但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已经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共识。特别是中国在收回香港之后,中共十五大决定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现代化建设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在谋求成为世界各国的伙伴的过程中,同有关国家一道,努力突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难以超越、强国相邻难以和平共处、大国对小国难以平等相待、国际争端难以和平解决等旧思维,积极倡导以平等相处、利益相依、和平对话、友好合作等为重要内容的新的国际政治思维和安全观念。这将赋予传统的地缘政治斗争以新的含义。

##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汪徐和

1997年是大国战略关系相对稳定、国际安全形势总体上持续缓和的一年,安全合作呈加强趋势,地区冲突虽然存在,但其强度和影响力有所下降,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加快,但世界各种矛盾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和局部动荡依然困扰国际社会。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是:

一、大国战略关系相对稳定,虽然争夺地区安全事务主导权的斗争仍很激烈,但协调与合作的势头在增强。大国关系经过冷战后几年的调整变化,现已基本定型,形成了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美五大战略伙伴关系。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中美两国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大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依然存在,并突出体现在争夺地区安全事务主导权方面,如美、欧、俄围绕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斗争等。但是,随着世界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迅猛发展,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大国通过对自身战略利益的深刻反思,都力避对抗和冲突,将安全利益的矛盾尽可能限制在可控制的程度之内,巩固大国之间不使用武力解决分歧的默契,并努力通过协调与合作解决矛盾和分歧,这是推动国际安全形势持续缓和的重要基础。

二、威胁国际安全的因素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层次化,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

三、以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经济安全的地位更显突出,但传统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仍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

四、合作安全模式成为冷战后重塑国际和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趋势,但也出现了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的危险倾向。合作安全主要是通过世界范围内或地区各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来实现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并达到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目的。它强调建立信任,加强和扩大合作,防止战争和冲突,而不是进行对抗和遏制,一味地追求或扩张本国的安全利益甚至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应该说,它代表了未来国际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是确保各国安全的重要途径。然而,某些国家在冷战后并没有因为一个强大对手消失而放弃冷战思维,而是继续寻找甚至刻意制造新的战略对手,以新的军事集团化追求其对世界的独霸地位。在欧洲,美极力推动北约东扩,直逼俄罗斯城下,挤占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战略空间。在亚洲,美日重新定义《日美安全保障条

约》后,又出台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日美防卫合作范围从“远东”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日本自卫队的作用从保卫国土的“专守防卫”扩展到参与美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要在东亚建立“小北约”。新的军事集团化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举措,它不仅损害了他国的安全利益,危及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且给它们自身带来的也不会是安全的福音。

## 关于1997年大国关系的若干特点

国防大学 江凌飞  
副教授

纵观1997年的大国关系变化,有如下四个突出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大国关系调整变动的趋势进一步趋向平衡,而不是更加失衡。大国经过一段竞争较量的结果,相互对对方的实力地位都有了比较切实的确认与肯定,对自身的实力状况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相互关系中不可不说各自都接近于找到符合自己身份的角色和相互打交道的联结点,大国架构的平衡感与稳定性明显在增强而不是削弱。

第二个特点是大国调整相互关系的全方位性与日益增强的合作趋势。近年来,大国关系的战略调整虽然不是均等的,存在着亲疏、倾斜,甚至还出现了加强军事同盟的倾向,但总的来讲,各大国更注重拓展全方位外交,构筑有利于己的多边平衡关系,战略调整的重点不在强化分歧、谋求对抗,而是强调站在全球的高度,着眼于下个世纪,发展以交往、接触与合作为内容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特点今年尤为明显。由此正在编织出越来越复杂的大国关系网络,形成多国利益重迭交差相互制衡的局面,这有利于推动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从上述两个特点中,可以预期,国际形势总体趋缓的局面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持,对跨世纪的国际和平环境持悲观态度是缺乏根据的。

第三个特点是美国在当前大国关系的战略调整中处于主动地位,它的战略思路比较清晰,贯彻其战略意图的动作比较坚决,得分较多。今年以来,在北约东扩、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改善美中关系、拉住美俄关系,以及在中东、拉美、非洲、中亚地区的战略动向中,美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得分。克林顿第二任内的外交作为明显强于第一任,反映美国经济超强实力恢复后在国际上确立独家领导地位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克林顿政府似主要采纳了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主张,同时兼取新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大力贯彻实施其以“参与”(交往、接触)为中心内容的战略,辅之以军事威慑和政治遏制,以达到控制盟国,制

服对手,力争在不引起严重对抗局面的情况下,把世界纳入到美国设计的国际体系中去。欧洲和日本分别在东西两洋加强同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同时又一再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也表现出谋求建立美日欧三极共同主宰世界事务的迹象。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总体局面还将继续下去。中国虽处在崛起和复兴的上升阶段,但仍是战略防御态度。“一超多强”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美国既是众强力量的出头鸟,又是与多强发生矛盾的中心国,中国应力避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也不宜在诸强中逞强出头,置换前苏联的位置,扮演挑战者的角色。

第四个特点是大国关系调整带有明显的两重性,对抗性的竞争与合作性的交往成为大国关系的两个矛盾的发展趋势。拿美国对华政策来说,就受到两个基本点的规定。一是维持历史转型期的霸权稳定,与崛起的潜在敌手——中国打交道,是美国新时期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它使中美关系潜伏着走向对抗的危机;另一方面,新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又受到时代潮流、多极化格局、经济科技因素上升和国际关系全球化等冷战后国际大气候、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这又限制了美中冲突的强度,为两国发展合作关系提供了可能。美俄关系、北(约)俄关系也有类似情况。

## 世界大国关系的新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 高 恒  
世经政所研究员

1997年,世界大国关系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它是围绕着抢占21世纪世界战略制高点而展开的。在这个进程中,它正在展现和将要展现下列新特点:

一、世界大国综合实力对比进一步走向均衡化。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现象不断加剧。世界大国综合实力对比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经济在总体上继续改善,但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进一步相对下降,难以阻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日本经济出现改善势头,但国际形象不佳。德国在“消化”东德地区的过程中有了进一步进展,德法俄三边关系紧密程度有所增强,但距离世界级大国还有相当路途。俄罗斯经济下滑正在减缓,并出现不少复苏迹象,社会凝聚力有所增强,国际影响力有所恢复。中国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上述事实表明,超级大国美国与日、德、俄、中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也就是说,世界大国综合实力对比正在进一步走向均衡化。

二、世界大国关系正在呈现出更多的民主化趋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视是唯一超级大国,极力构筑

“单极世界”,妄图充当“世界宪兵”和“世界领袖”。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领域美国都想占据主导地位,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美国在大国关系中连连碰壁,不断受挫。从1989年起,美国极力想扼杀中国,甚至企图使中国进一步分裂。但是,美国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江泽民主席顺利访问表明,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遭到巨大失败。今年夏天,美国极力主张的“北约东扩”有了确实的进展,(波、匈、捷加入北约),但是,它把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了“对手”的地位。俄罗斯外交空前活跃(对亚太、中东、西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和“抵消”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接受了日美安保条约新方针。但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充当世界级大国)却不得不尽力修好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领导伙伴”。为了自身利益(充当世界级大国),德国今年夏天极力与俄国、法国密切关系,进一步增强了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德、法、俄”三角关系的形成无疑将是制约美国的重大“战略因素”。上述事实表明,一、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世界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世界大国关系正在呈现出更多的民主化趋势。

三、世界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造问题上的角逐进一步加剧。

联合国、安理会的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产物。它建立在当时的世界力量对比和基础之上。时至今日,世界力量对比、世界大国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和德国不断强大,中国逐步走向复兴,发展中国家日益崛起。对此,任何国家、任何国际组织都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联合国和安理会等更成为它们彼此角逐的中心“战场”。美国极力要拉日本、德国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却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安南方案”的出台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世界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角逐正在进一步加剧,“戏剧”高潮将会加速到来。

四、世界大国争夺战略重点的斗争出现明显位移。

冷战结束以后,东欧和原苏联等地区出现了激烈的历史性的动荡。随着上述地区有关国家经济政治转轨的加快,波黑、车臣等热点不断“降温”。从总体上看,局势正走向“相对平稳”状态。与此同时,二战后战略重点欧洲也正在进入“相对平静”时期。在非洲、拉丁美洲、亚太等地区,局势发展也呈现出“相对平缓”局面。但全球事态发展表明,世界大国间争夺战略重点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其表现是:中亚、里海地区正在成为世界大国争夺的新的战略重点。这是因为,中亚、里海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在战略、经济等方面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该地区石油开发的良好前景(仅次于波斯湾的世界第二大油库)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发展,使得世界有关大国纷纷插手这一地区的事务。特别是美国与俄国更将成为这个新舞台上的主要

角色。

五、世界大国正在进一步把争夺经济主导权视为战略决胜的关键环节。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综合国力大较量的新时代。随着信息技术与信息事业的迅猛发展,世界大国综合实力的对比面临着重新调整的严峻局面。为了使自己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有关国家正在把经济外交置于政府外交的核心地位。美国在处理美欧关系、美日关系时,正在更多地着眼于商业贸易的竞争。美国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正在更多地着眼于能源的开发。美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正在更多地着眼于商业贸易利益的得失。中美关系的大幅度改善(实现首脑互访)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一定意义上讲,美俄关系的起伏也主要起源于经济利益的矛盾(西方援助不到位与中亚、里海石油争夺等)。总之,世界大国正在进一步把争夺经济主导权视为战略决胜的最大关键环节。事实将表明,21世纪世界战略制高点就是综合国力的强弱。其中,经济则是其中的核心。只要哪个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哪个国家就会掌握世界战略主动权,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今年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的事态发展将更会证明这一点。

## 多极化进程中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政治教研室教授 杨 铮

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要认真研究大三角关系。”当前这个命题仍无可置疑。在国家作为一个实体尚未在地球上消失前,国家间的矛盾和利害关系不会因经济的相互依赖而消失,国家力量之间相互助长、互补、抵消依然存在。

一年来,多极化格局向纵深发展,大国关系中的中美俄三角战略互动关系正以崭新面貌亮相于国际舞台。作为分析大国关系的框架,中美俄三角关系的结构、内涵和性质都发生重大变化,不能同中美苏三角关系同日而语。这种变化的动因,来自地缘政治结构的变迁、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

“中国因素”几乎成为今年国际关系变动的焦点,也是新三角关系最突出的特征。由于中国力量迅猛上升,在大三角关系中不再以“筹码”身份立足。美国政治家弗兰茨·舒尔曼认为,“当今世界上只剩下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美国日益把自己看成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中国把政治世界看作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其间中国人口已是最大的,不久经济开发方面亦将如此。”俄国学者表示,“中国的全球利益和全球作用得到美国和俄国的承

认,到下世纪中国有可能达到同美国的战略均势。”这意味着以美苏为两极的结构向美中为核心的不等边三角形关系转化。一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在“接触与遏制”、“发展与围堵”之间进行选择,目的是防止中国对美国“领导世界”地位构成威胁。尽管在人权、核扩散等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但这都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制造“中美冲突”论,乃是人为的喧嚣。在中美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存在着“制衡与反制衡”的斗争。

北约东扩是美国保持在欧洲领导地位的一种尝试。对俄罗斯而言,北约东扩意味着从彼得大帝到苏联长期建立起来的西部战略屏障有丧失殆尽的危险。新三角关系中,美俄力量一突一凹,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利用了这一对比的优势加强东进攻势。俄国力量虽不比当年,但其强大的核军备,仍是“威胁美国的危险因素”。过去美国借助中国制衡苏联,现在则利用欧盟对付俄国。5年来,俄国已从科济列夫的阴影中尝到苦头,重新调整外交政策,向东方伸出友谊之手,首先是加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在人权、联合国改革、反对“赫伯法”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的立场。中俄两国关系处于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国多次表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针对任何国家,也并非结盟关系,正如最近江泽民访美达成的“中美战略对话”关系一样,都不是像旧三角关系那样“两角联系”对付另一角。但是双边关系力量互补,在客观上是增强两国实力起到抵消第三种力量的作用。

由于经济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世界在和平发展大环境下,一种新的关系架构正在形成。它不是建立在“势不两立”、互相敌视、互相削弱、互相孤立及“零和游戏”的基础上,军事对抗、军备竞赛因素大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需要、相互联系、相互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制衡的新内涵。21世纪世界经济大三角将跃居政治大三角之上。但是,国家利益的交叉,经济政治之间的交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别,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使中美俄三角关系在世界格局过渡调整时期,呈松散和缺乏秩序状态。新形势下,即多极化格局中,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游戏规则”有待健全。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外交棋盘上的一支稳定平衡力量,必将在未来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冯昭奎

在冷战后的世界,多极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然而,从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来看,世界呈现为“一超多

强”的格局。“一超”是美国，“多强”中包括中、日，因此，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作为“两强”的中日分别与作为“一超”的美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中日之间的关系也走出历史上的“强弱型”或“弱强型”关系，日益具有“强强型”关系的特征。

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一个不平衡的三角形。其一是三角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等不同领域的发展的不平衡，即在经济领域的关系发展较快，而在政治、特别是安全领域的关系发展相当滞后；其二是三角关系的三个边的发展的不平衡，即日美边很强，中美边、中日边较弱，至于在中美、中日这两个边之间，有时中日边强于中美边（例如在90年代初），有时中美边强于中日边；其三是三角关系的三个角的战略地位的不平衡，即对于最强大的美国来说，日本处于“同盟者”的地位，而中国却正在被某些势力推向“挑战者”的地位。

以上三个不平衡，即不同领域的关系发展不平衡、不同边的强弱不平衡和三个角的战略地位不平衡，当然是相互联系的，也可以说是整个三角关系不平衡的三个侧面。

不平衡的三角关系必然是不稳定的三角关系。这里说的“不稳定”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三角关系本身的不稳定，其二是不平衡的中美日三角关系必然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因此，为了促进中美日三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也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促使中美日三角关系从不平衡趋向平衡。

然而，事与愿违。美日于去年发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并于今年修改防卫合作方针，进一步加剧了三角关系的不平衡。首先，美日加强军事同盟促使本来就偏强的美日边进一步增强，本来就偏弱的中美边与中日边进一步被削弱；同时，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者的战略地位不仅得到“再确认”而且被进一步强化，与这种变化相配合，美日两国的某些势力则起劲地宣扬“中国威胁论”，露骨地要将中国推上取代原苏联的对美“挑战者”的地位。在这个背景下，中美、中日之间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关系发展不能不受到负面的影响，从而加剧了政治、安全、经济等不同领域关系发展的不平衡。

然而，中国为了坚定不移地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把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自己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同时把维护世界的、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作为自己的崇高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需要发展对美、对日关系，促使中美日三角关系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同时，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美国、日本发展合作关系，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总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是要根据国家的基本战略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来决定的，任何别有用心的人想通过刺激、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将我国推上他们所安排的战略地位，肯定是徒劳的。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促使中美、中日关系趋向好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特别是最近江泽民主席访美成功，双方确认了要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从而被称为是继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在中日关系方面还需要作出努力。如果说1972年中日复交、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战后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第二个里程碑的话，那么，在江泽民访美取得成功之后，如何给“发展很大，问题也不少”的中日关系以一个堪称“第三个里程碑”的、新的有力的推进，则有待两国政治家作出明智的决断。

## 中美、中俄关系的突破性进展带来的启示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卫 灵

一、1997年是中美、中俄关系显著发展的一年，其成果令世界瞩目。

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在经过“一边倒”——“双头鹰”——全方位外交的调整、定位之后，1996年俄中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两国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4月和11月，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确认中俄已经建立起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中俄关系的发展推向高潮。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中美双方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使中美关系在政治、经贸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中美、中俄关系的演变使中美俄之间呈现新的互动态势，合作借重与争夺制约在大国关系中加强，中国利用可借重的力量，谋取战略主动。

近年来中俄双方的接近是美俄、美中关系倒退的结果。冷战后的美国已取代冷战时期的苏联成为三角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谋求主导世界，造成对俄、中两国利益不同程度的损害。俄、中相互借重，形成合力，增强对美的制衡力量。

充当“世界主角”的美国不可能坐视中俄关系的接近。自1996年4月叶利钦访华之后，美从其长远战略利益出发，开始了对华政策的逐步调整，终于在1997年下半年使1989年以来美中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得到根本扭转。

中美俄之间形成复杂微妙的新型三角关系，中国在美俄两国之间赢得了战略主动，迫使大国承认这样一点：中国已成为必须在相互信任、尊重的基础上与之打交道的重要力量。

三、经济因素是促使中美俄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冷战时期大三角关系中的排他性双边外交也因经济因素的上升失去意义。

经贸关系是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改善的基础和纽带,中美、中俄之间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使双边合作成为可能。江泽民率经贸代表团访美受到美国企业界的热烈欢迎,双方签署了价值40亿美元的合作意向书;中俄双方也已达成协议,在2000年以前使双边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需要美国作出积极的反应。发展经济关系需要改善政治关系;经济外交对促进政治外交亦产生积极作用。

随着经济因素的上升,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加强,不再意味着对第三者的排斥。当中俄加强接触、共同抑制美国时,美国在中、俄外交战略中仍居头等重要位置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有利于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而中美、中俄关系的发展又有助于大国间力量的牵制,使世界沿着多极化的轨道发展。

这一点将随着中美俄三角结构向中美俄日四边结构在亚太地区的发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且对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 地缘政治的两大焦点及其影响

北京 大学 李义虎  
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后冷战时代以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结构大变动作为开始的标志。1997年,这种变动进一步深化,除了各种地区性冲突和热点外,从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看,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焦点,即北约东扩和美日安全保障体制扩大化。二者均为冷战时代的产物,但在后冷战时代都突破了原有的结构框架。北约东扩跨越了原集团政治的地理范围,美日安保体制则超出“双边范围”,要涵盖住亚太地区三大热点(朝鲜半岛、台海地区和南中国海)。

对此,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二者,应把二者联系起来看,即二者的联动效应将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其结果是:一、外围或边缘地带将再现逼向“大陆心脏地带”的压迫之势,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的接近成为客观的必然。中俄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虽不同于50年代结盟的性质,但仍具有地缘政治的结构价值。况且,现在也不是以结盟为国际关系主要样式的时代,而是创造和展示新的国际关系样式的时代。正如中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所说,双方是建立了新型安全关系的模式。二、“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两大地缘焦点,一侧是欧洲,一侧是日本,但重点烘托的

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虽然不能把三者的关系简单归纳为“三角关系”,但显然这三个大国的关系形态对国际关系总体结构和地缘政治战略变动带有根本性的意义。三者关系的重心转移亦将牵引欧亚大陆地缘政治重心的转移,从而对国际关系整体结构产生致命的影响。这是美俄中任何一方也不敢小看的。

在此情形下,对于中国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基本选择来讲,有一个如何在东西之间左右逢源、运用自如的问题。“北约东扩”的压力在俄罗斯身上,效果可能出在中国这里。这就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新的战略选择空间和重大的外交机会。现在,中国国家战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中国目前正处于什么样的地缘政治位置上,而地缘政治的钥匙又在哪里,我们如何通过有智慧的战略选择和有成效的外交作为,去掌握和使用这把钥匙。

今年尤其是下半年,大国关系的互动更加密切,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状态。中美、中俄、俄日、中日等领导人交往频繁,出访或互访的频率迅速升高,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其中有可能隐含着世纪之交大国关系形态变动的主要趋势和特征。在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变动的整体布景下,新的国际关系的力量支点正在出现和生长,欧亚大陆“心脏”与“边缘”地带的国际关系正在重新排列开来,也就是说,大国又一次开始“重新洗牌”了。

## 江泽民主席访美后的中美关系

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郭思勉

### 一、对江泽民主席访美的评析

这次访问是成功的,好于预期。表现在:一是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美方原不大愿意,只想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二是改善了气氛(应有的礼遇,金里奇也表现克制,双方建立了接触机制);三是影响了美国舆论(与美各界广泛接触,改善了我国在美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总的看,中美关系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符合我国利益。但对前景的估计不宜过于乐观,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是有限度的,因双方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仍然存在,中美关系不断出现麻烦甚至挫折仍难以避免。

### 二、中美关系能够出现改善势头的原因

(一)美国内反华势力和主张对华接触的力量都在发展,今年初美国内出现一股强劲的反华逆流后不久,美政界、学术界、企业界一些有识之士陆续发表文章、谈话予以批驳。这对美政府主流派坚持对华接触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对华“接触政策”在美领导层内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如无意外因素,不致发

生大的改变。

(三)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两国经济利益的推动。

### 三、中美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美国国会和社会上的反华势力仍相当强,不可低估。国会的一些议员仍在酝酿一些反华议案。只是在江主席访美期间暂不出台而已。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继续增强,反华势力和他们鼓吹的“中国威胁论”还会不时出来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

### (二)中美战略利益的矛盾难以调和

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构筑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世界”,不允许在世界任何地区出现威胁美国主导地位的大国,而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多极化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双方的战略利益存在根本矛盾。美国口头说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实则并不愿意看到中国真正强盛起来。美国对中国的戒心不仅没有减轻,还会继续增强。因此,对中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宜看得过重。钱其琛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结盟关系”,而是大国之间“一种不相互敌对、不相互对抗的新型关系”。美前驻华大使洛德说得很清楚:“一边是超级大国,另一边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绝不会一帆风顺。有希望取得进步,总有挫折。”

### (三)意识形态因素仍起重要作用

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目标没有变,对华的两手政策没有变,只是策略上有所改变,从遏制为主转为通过接触促使中国演变为主。对“接触”一词应作正确的理解。1997年上半年,洛德曾对“接触”作了注解:“接触意味着合作和坚韧的磋商。合作还意味着在人权问题上直言不讳,以制裁为后盾促成贸易和核不扩散协议,向台湾海峡派出航空母舰,维护我们同盟国的关系以及保持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现有的武装力量”。由此可以看出,“接触”与遏制在本质上并不矛盾,美国今后仍会在人权、民主、西藏等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

## 新时期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

北 京 大 学 张小明  
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江泽民主席同克林顿总统在白宫进行最高级会晤之后,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两国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进行战略合作总得有一个基础。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呢?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因素”不复存在,如何确立新时期两国间战略合作的基础,这是摆在中美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无疑,经贸关系是维系两国关系的一个“粘合剂”,但是它不足以作为

两国合作的唯一基础。冷战后的世界形势要比冷战时期复杂得多,敌友关系不易确定,也就不可能确定一个共同的敌人作为两国间战略合作的基础。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需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它无力也不愿意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抗,维持一个良好与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近年来,美国领导人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与中国合作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正如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10月24日就江主席访美发表的讲话中所指出的:“美国现在必须继续奉行与中国接触的政策。通过与中国开展合作和明确指出我们之间有必要指出的分歧,我们就能促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促使中国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使未来的中国像过去的中国一样伟大。”因此,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问题上已经有了共识,这就是:双方都不愿意相互对抗,而希望两国在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这种共识能否说就是新时期中美两国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呢?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经过几年的动荡不定之后,中美两国已找到了新时期两国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道路虽然不可能是十分平坦的,但是至少相对“六·四”以后几年的状况来看会顺利一些。如果非要为冷战后中美战略合作寻找一个共同“敌人”的话,那么冷战后世界局势的不确定与不稳定就可以视为这样一个“敌人”。

## 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外交学院教授 苏 格

### 一、中美关系“雨后初晴”

1996年初,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中美关系一度跌入低谷。此后,中美双方均为改善关系作出了努力。11月份,江泽民主席在出席马尼拉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中美两国元首将在1997年和1998年相互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和克林顿的成功会见使从低谷中攀升的中美关系恢复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江泽民主席将之形象地比喻为“雨后初晴”。

### 二、1997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与波折

1997年上半年,中美关系进展的标志包括:(1)中美间实现了多起高层互访。继上年底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对美国进行了工作访问之后,1997年新春伊始,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副总统戈尔、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和一些军方高级领导人先后访华,钱其琛外长也对美国进行了访问;(2)经贸合作有了新进展,如波音公司和通用公司与中国有关方面签署了大宗经济合作协议;(3)中美军事交



往出现恢复和发展,中国舰队应邀对美国军港进行了成功的访问;(4)克林顿政府宣布将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等;(5)香港顺利回归中国,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出席政权交接仪式。这些,均代表着中美关系积极发展和正常交往的主流。然而,在中美关系出现新局面的同时,美国政坛也时而泛起种种逆流。例如:(1)由于《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等书籍和文章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一度引起了美国对华舆论的巨大混乱;(2)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捕风捉影,诬称中国政府“卷入”所谓“政治献金案”,使中国的形象受到严重伤害;(3)美国政界有人继续在台湾、西藏和香港问题上大做文章。但这些倒行逆施,终究无法阻挡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潮流。

### 三、1997年下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破性发展

1997年中美关系最为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就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于10月26日至11月3日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以及两国跨世纪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关于双边关系的意义,双方认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实现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重要的。双方同意,中美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例如,在人权问题上,中美之间就存在重要分歧。但是,双方又在诸多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共同利益,在不少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包括:(1)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促进全球经济增长;(3)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4)推动亚太区域合作;(5)打击贩毒、国际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6)加强双边经济发展与贸易;(7)增强双方在法律、环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交流;(8)建立和加强双方军队的往来等。中美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中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是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那种“战略”概念,不针对第三者,也不具有排他性。其目的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当然,建立这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中就没有分歧。例如,中美之间还存在台湾问题这个核心问题,但是,只要中美双方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妥善地处理问题,中美关系的大局就是能够得以维系和发展的。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应该看到的是:尽管中美两国关系过去有过波折,但总的说来是向前发展的;尽管中美两国存在分歧,但两国的友好互利和合作仍然具有广泛的基础。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1)“冷战”结束后,世界各种力量经过重新组合后,呈现出“多极化”的国际趋势。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双方对维

护世界和平和区域稳定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2)“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世界主题后,经济相互依存使得中美双方需要加强联系,互通有无。两国经济合作的范围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3)一些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相对上升,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总之,在人类社会即将结束20世纪的旅程之时,愿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能进一步“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将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

## 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德照

一、冷战结束后,经济安全在发展中国家总体安全中的地位上升。但冷战后经济安全的内容并未得到应有的研究和阐述。

二、经济安全问题所以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阐述,是因为经济安全在冷战后的实践中到底具有哪些内涵不清楚,这本身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1997年,世界经济政治实践在两个方面提出了这一问题。一是在贸易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抵制美国的“赫姆斯-伯顿法”。该法案的提出在1996年,但各国的抵制在1997年达到高潮,认为这是美国在贸易中实行治外法权的表现。二是在金融领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许多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的蔓延使有关国家的经济安全,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威胁。

1. 汇率稳定受到破坏,外汇储备严重流失;
2. 金融体系动荡和瘫痪;
3. 金融形势(汇率、利率、股市)动荡;
4. 国家、企业、居民的直接经济损失;
5. 影响甚至中止了正常的经济发展进程;
6. 国际经济地位(贸易、投资)下降;
7. 综合国力的增长、扩大受阻。

除此之外,为克服金融危机,爆发危机的国家常常不得不打乱对外开放的正常秩序,接受国际经济组织和外国的经济援助,使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制于他人。

四、无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情况看,金融危机对所在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和影响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削弱或破坏本国的金融秩序,削弱本国的金融实力,增加了本国金融界对西方金融集团和金融势力的单方面依赖;二是削弱本国总体经济实力,削弱或限制了本国行使经济主权的力和范围。

五、由于金融资本数量增加,金融创新手段日益繁多,金融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流动范围日益扩大,金融安全在经济安全中的作用和地位在上升,目前世界经济中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和风波。一种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一种是地区性的金融危机,一种是严格的个别国家的金融危机。这三种危机从爆发的频度和可能性看,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

六、1987年以来世界共爆发过三次影响最大的金融危机,1987年的纽约股市危机,1994年底199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三次危机中两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说明发展中新兴市场虽然发展很快,但却有着重大的脆弱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由于股市不发达,三次危机中,对其影响最深的是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但迄今为止,我们研究的多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注意和研究都不够。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七、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首先发生在汇价、汇市和汇率体制中,但两次危机又都波及股市等其他金融领域,对有的地区,如香港,目前对其经济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汇市,而是股市。汇市和股市动荡相互作用和影响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健康发展造成威胁。

八、美国经济学家拉鲁什认为,年内有可能爆发一次较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它将对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不管拉鲁什的判断和结论是否正确,对他提出的目前美国日本等金融和经济形势中存在的“危机征兆”,我们需要冷静和认真地予以研究。

## 金融危机与国家安全

新华社国际部 杨元华

在维护经济安全和发展经济中,金融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时代发展的基本需要和要求,金融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形式和表现。

90年代初以来,国际金融动荡频率明显增多,专家估计,15年来世界平均每五个星期爆发一场金融危机,给一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甚至波及地区或世界经济的发展。

7月初以来爆发的东南亚货币危机以及10月下旬发生的全球股市大暴跌,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烈度之大,实属1987年股市大暴跌以来首次,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政局和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金融安全已成为世人聚焦的热点。

当前,国际金融形势风云变幻,瞬息百态,出现了与

过去不同的一些特点和反常现象,国际资本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许多带有投机性的短期资本与信贷资本合而为一构成投机性集资的“套利基金”,正在世界各地游荡,随时冲击着脆弱的金融市场,不断酿成金融动荡和危机。

当前股市动荡与货币动荡交织影响和互动作用十分突出,构成了股市发展的新趋势:

一、股市发展不平衡加剧;二、金融活动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三、国际资本空前膨胀和流动性加速;四、脱离实物经济的“虚拟资本”急剧增长;五、股市波动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增多;六、股市发展方兴未艾;七、全球金融机制与股市迅猛发展和资金流量增多、加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金融正进入激烈动荡的调整期。

在上述趋势的影响下,今年股市动荡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动荡烈度大,股市大起大落,一些主要股市股指日升点数和日跌点数均创历史最高记录,纽约、巴黎、加拿大和巴西股市均因涨跌幅度过大而开创了停盘的纪录。上市公司市值空前扩大,纽约和香港股市日交易量创历史记录。

二、由于各国对动荡的承受力增大,危机一般局限于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尽管金融危机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震撼全球,但有惊无险,不至于导致全球股市危机和重蹈30年代金融大危机的覆辙。

三、动荡震源不再始终来自执全球股市牛耳的纽约股市。这次全球股市大暴跌主要来自于以东南亚货币危机为开端的香港股市暴跌。尽管纽约股市目前在全球仍处于不可替代的领头羊的地位,但这次震源点的移位,表明全球股市发展的新特点。

四、本轮股市激烈动荡不是由于经济滑坡、通货膨胀剧升或一般意义上的利率上扬而造成的,都是从汇率变动和货币战而酿成的。

五、金融动荡趋于扩散,而非收敛,并已从过去的发达国家向政策失误、结构严重失衡和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蔓延。

六、短期资产无监控的自由流动和金融资本投机炒作是酿成危机的主要直接原因。

七、股市动荡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之间的互动作用增强,经济和政治变化以及政局更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股市。

总之,金融动荡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股市变化并不像经济发展变化那样具有周期性,在以全球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下,股市狂泻反映了其不稳定性、风险性、破坏性和投机性增大,是其过分超值的调整,也是以投机资本为主的市场力量与金融当局的较量。可以说,动荡与发展并存,暴涨与暴跌交错,风险性和难以预测性增大,是当前股市的主要特征,也是经济

结构和股市自身调整的表现。尽管金融活动在加速脱离实体经济自行运转,但归根结底仍不能不受经济发展的制约。

当前,金融部门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显突出,对维护国家综合安全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信任危机和结构性危机。股市和汇率暴跌,不仅由于资金抽逃而使经济面临瘫痪的威胁,导致政局和社会震荡或危机,政府在国内外信任度下降,而且削弱国家经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不能保障政治独立。经济上的依附性可能影响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国家丧失维护安全的能力。因此,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国在21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

## 联合国改革和联合国的作用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高级记者 钱文荣

联合国安南秘书长于1997年7月16日提出了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联合国的改革及其未来的作用变成了今年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重大事件之一,我谈几点看法:

一、对秘书长改革方案的评价。联合国改革是全体成员国多年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因此,从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情况看,大家对秘书长力图通过改革提高联合国的效率以便更好地迎接下个世纪的挑战所作的努力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但对改革方案的评价,则因其涉及各成员国和国家集团不同的利益,各不相同。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个方案更多地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观点和利益,其中最突出的有几点:

第一、方案提出设立一位常务副秘书长,美国《纽约时报》社论大加赞赏,但不少发展中国家担心,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削弱秘书长的权力而不是加强联合国的领导,认为某些大国的目的是借此机会要安插自己的人,以加强对秘书处的控制和干预。

第二、方案提出要加强裁军和军备控制,今后不但要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控制,而且还要加强对常规武器的管制。不少国家认为,这是某些大国企图把裁军的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

第三、方案提出要加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中的作用,把联合国下属人权组织提高到成为“全面监督全球人权事务中心”。许多国家担心,这可能被某些大国利用来更多地干涉各国的内政。

发展中国家担心,这个方案若不作任何修改而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有可能使联合国进一步置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控制之下。因此,安南的改革方案在本届

联大大概只能原则通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难以达成一致,会后将会继续争论下去。

二、联合国在维和领域内作用下降,发展援助减少。尽管秘书长的改革方案提出要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作用,并要把发展问题提到优先地位。但是,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是联合国在维和领域内的作用明显下降。联合国在波黑的维和部队已于1996年撤出,完全被北约多国稳定部队所替代。近年来非洲部分地区内战不息,此起彼伏。但自从美国倡导的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失败以来,西方大国都不愿再卷入其中,因此,联合国对制止那里的武装冲突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有力的行动,只是搞一点人道主义救济活动而已,这与冷战结束头三年内联合国到处派维和部队形成了鲜明对照。其原因除了缺乏经费外,最主要的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改变。美国早在1994年7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把联合国的作用降到第三位,置于它的盟国之后。今年7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文章说:“美国的基本观点是联合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现在宁可把资源用于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上”。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说:“今后,较强有力的维和使命可能不是由联合国来执行,而是由行动受政治约束较少的区域联盟来执行。”现在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如此,扎伊尔和刚果内战的情况表明,除非关系到西方大国的重大利益,否则它们将不再主张由联合国帮助制止冲突。美、英、法正在训练一支非洲人的维和部队,也说明了这种趋势。

至于发展问题,虽然改革方案中提出要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作为联合国的“中心优先任务”,但具体措施不多。方案说要把2002年前节省下来的两亿美元行政开支费用用于资助发展。可是,这个数字对于一百几十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按联合国的大会决议规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应占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的0.7%。事实上,这几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不断减少,今年已下降到了0.25%。

三、安理会改革没有任何进展。虽然安南改革方案中避开了这个最困难的问题,安理会改革仍然是今年联大辩论最激烈的问题。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坚持安理会扩大必须遵循地域分配均衡原则,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于7月中宣布同意除德、日外增加三个发展中国家为常任理事国。但因安理会扩大涉及到权力再分配以及大国和国家集团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各方难以达成共识,发展中国家之间就谁当常任理事国也很难取得一致。因此,这个问题今后一、两年内仍没有解决的可能。

日、德两国在本届联大内外企图用减少支付会费的威胁手段来达到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目的。日本提出了“责任支付”原则,意思是说如果它当了常任理事国,它可

以多付钱,不然它就要少付钱。这实际上是要否定联合国大会确定的按“能力支付”的原则。日本外相小渊在联大发言中说:如果安理会改革不能实现,要日本增加联合国会费份额,那将是困难的。日本的这种威胁性语言在联合国内受到了不少非议。

四、关于联合国今后的发展趋势。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不断加强,世界更需要联合国。但是,也应该承认,联合国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的政治意愿和需要。根据近几年的情况,联合国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一)联合国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于安理会改革的斗争将继续下去,这个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二)今后西方大国将利用联合国在人权、人道主义援助和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更多的作用。(三)区域组织将利用联合国的名义在维和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北约的维和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四)非政府组织将在联合国的活动和决策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安南秘书长把加强非政府组织包括跨国公司在联合国内的作用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这是涉及联合国性质的大问题,即今后联合国是否仍将是一个纯粹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 俄罗斯与八国集团

外交学院副教授 刘赛力

1997年6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以同等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在美国丹佛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原先以“西方”和“发达国家”作为参加条件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因俄罗斯的正式出席而改变了性质,由七国体制改变为八国体制,且会议发生了由经济会议变为政治会议的质变,政治色彩大大加重。

本来叶利钦希望在1996年的里昂会议上基本实现正式参加七国集团,但由于忙于大选及健康原因他未能亲自与会,而由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代为出席。而在1997年丹佛会议上,叶利钦终于首次作为正式代表与西方七国首脑一起讨论全球问题。与会各国就俄参加巴黎债权国俱乐部达成了原则协议。参加该俱乐部不仅能让俄收回其他国家拖欠前苏联的债务,还能提高俄的资信,有利于俄吸引外资。此外,叶利钦还通过在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一系列双边会晤拉近了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俄之所以能在1997年如愿以偿,至少在形式上成为八国集团的成员,与美日等西方大国的态度有直接关系。西方大国,特别是美拉俄参加西方的首脑会议主要出于两点考虑:首先,苏联解体后俄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

抬头。为防止俄东山再起,美在支持以叶利钦为首的改革派的同时,希望将俄纳入西方控制下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中,以巩固冷战成果,防止俄成为向美主导地位挑战的力量。克林顿政府认为让俄参加七国集团“有助于将俄定位在民主国家的行列”,以便对俄施加更多的影响,其次,1997年北约东扩已进入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对于北约东扩,俄虽一直表示坚决反对,但其目前的实力地位又使其无力阻拦这一进程。以北约与俄的一系列谈判为背景,美、俄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俄力求最大限度的维护切身利益;美为换取俄对北约东扩的默许,也注意适当照顾俄的实际利益。克林顿在说服俄接受东扩并确定了俄与北约关系的同时,也向叶作出了一些增加政治、经济援助的许诺。克林顿1997年3月在赫尔辛基与叶利钦会晤时,以俄接受北约东扩为条件允诺支持俄加入“七国集团”。

对俄罗斯来说,1997年能作为平等成员参加丹佛首脑会议,不仅是个形式问题。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加强俄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同时为其国内的政治经济运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俄1997年虽然初步实现了变7+1为8的目标,但它毕竟还不能百分之百地参加会议,仍然有一小时的会议要按8-1的形式进行。俄被排除在首脑会议的经济议题之外本身就说明俄距成为这个富国俱乐部的“完全成员”还有一段路程,目前俄实际上仍处于从属地位。

总之,俄国虽参加了八国集团,并不能解决俄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全部问题,俄也并未因此而于1997年取得公认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俄与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仍将继续下去。

## 西欧联合又有新进展, 独立自主进一步增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吴国庆  
欧洲所研究员

1997年西欧政治形势在平稳发展中发生深刻而又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西欧联合又有新的进展,独立自主进一步增强。

1997年,欧洲联盟频繁召开政府间会议和首脑会议,先后签订了《稳定与增长公约》、《阿姆斯特丹条约》替代《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大大加强了欧盟的凝聚力,提高了欧盟的政治内涵,使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朝纵深方向发展。中东欧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加速向欧盟靠拢,迄今已有10国正式提出申请并急于早日加入欧盟。目前,中东欧国家正在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各方面进行调整,以便尽可能与欧盟接轨,与此同时,欧盟也出台了东欧国家入盟的时间表。1997年北

约马德里会议决定波兰、捷克和匈牙利首批加入北约,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军事意义。欧盟和北约的双扩不仅标志着东欧国家“回归欧洲”步伐的加快,而且预示着欧洲地缘政治正在起着变化。1997年,欧盟主要国家的财政赤字经过努力都明显地下降,使明年达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规定的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的标准有望,使多数欧盟成员国能够首批使用欧元。而欧元计划的实现必将增强西欧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总之,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使西欧作为强大的一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1997年,以欧盟为主的西欧国家的独立自主倾向进一步发展。在经济上,欧盟在世界各大洲和各地与美国争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剧,如在非洲美国要挤进前法属非洲国家,法国则要维护传统势力范围。在军事防务上,年初法德出台《安全和防务共同构想》,使1963年戴高乐梦想的“法德防务共同体”有了眉目,并且在核威慑力量“欧洲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法国带头要求改革北约使之逐步“欧洲化”,要求北约地中海军事指挥权的计划经过一年的努力由于美国作梗受到挫折,但法国绝不会放弃初衷。它说明欧盟在军事安全上与美国的抗争在深层次展开。在外交上,法国通过希拉克总统今年9月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建立了“特殊伙伴关系”,确立了法—德—俄和法—德—波三国定期政治协商机制。这种双“政治三角”构成了新地缘政治中心,改变着欧洲地缘政治板块。1997年,欧盟与俄罗斯相互接近,同意共建“大欧洲”,由欧洲人决定欧洲人的事务,加强抗美的能力。今年初法国不参与“中国人权”决议案,打乱了美国反华联盟的阵脚。希拉克总统今年5月访华并建立法中“全面伙伴关系”,不仅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而且推动了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 波黑和平依然脆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朱行巧

波黑和平协议即代顿协议签署已经两年。总体而言,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协议的执行进展缓慢,和平局面能够维持,而民族仇恨却远未消除。

执行代顿协议的最成功之处是,实现了较稳固的停火,经济重建工作开始步入轨道。其次,顺利举行了战后首次大选,组建了波黑全国的主席团、政府和议会;再次,三方开始就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协商,并在使用共同货币、建立中央银行、全国民航管理局和联合电讯机构等方面达成了一致。但是,执行协议最不理想的方面是难民不能返回家园,居民在全国境内没有往来自由。此

外,被国际刑事法庭指控的战争罪犯绝大部分仍逍遥法外,在涉及各方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意见尖锐对立,很难达成协议。

波黑和平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冲突三方对执行代顿协议并非心悦诚服,他们对协议各取所需。特别是塞族和克族两方,本来就对建立中央政府不感兴趣,而对中央政府的管理权限自然分歧严重。尽管主席团、政府等联合机构照常开会,但这些机构并未真的治理国家,波黑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

在过去的一年里,波黑的中央政府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而两个实体——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也由于不断出现内部纷争而变得软弱无力。波黑战争爆发以来,塞族共和国一直由所谓强硬派领导。停战后,在西方的强大压力下,强硬派领导人卡拉季奇被迫下台,由普拉夫希奇接任总统职位。卡虽下台,但仍在幕后牢牢控制该共和国权力,而普不甘心充当挂名总统,于是同卡操纵的政府和议会展开激烈的角逐。塞族领导层内讧既是权力之争,也是政见分歧的反映。由于前领导人奉行强硬路线,塞族共和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它所得到的国际援助微乎其微,致使其经济命脉——农业和采矿业无法恢复,经济仍处于瘫痪状态。以普拉夫希奇为首的温和派认为,争取国际经济援助以重建家园是目前首要任务,为此必须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甚至不惜作出让步。但强硬派强调,不能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决不允许西方损害塞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尽管在米洛舍维奇的斡旋下,双方就年底前举行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达成了协议,斗争有所缓和,但塞族领导层的内部矛盾不会因选举而平息。

穆克联邦的建立本来就是一桩“强迫婚姻”,是美国为制衡和削弱塞族而强使两族联合的产物。自联邦成立以来,双方发表的声明、宣言和协议连篇累牍,而联合的实际行动却十分迟缓。双方对协议的执行往往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如在建立联邦权力机构和联合军事指挥部问题上,双方都不愿迈出实质性步骤。如果说穆克联邦还进行某些合作的话,那也是国际社会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诱饵所驱使的。穆克两族由于战时相互残杀而造成的不信任感依然强烈,双方控制区实际上成了两个实体。

代顿协议的执行进展缓慢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波黑局势的不稳定性给欧洲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国际社会明显加大了对三方的压力。以北约为首的维持稳定部队直接参与捉拿被指控的塞族战争嫌疑犯,迫使克族交出几名战争嫌疑犯。联合国还向三方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限期通过一些共同法律,否则就对他们进行惩罚。上述行动表明,国际社会对波黑的现状日益焦虑不安。

从近期看,以北约为首的国际部队仍会留驻波黑,以保障和平局面得以维持,而全面执行代顿协议则相当困难。至于实现波黑长治久安的远期目标——建立各民族和睦相处、统一完整的国家,则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

力。

## 我国的地区安全环境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 吴 鹏

随着亚太地区与欧洲大陆政治联系的加强,亚欧两大洲未来关系的基本框架初具雏形,东亚开始以国际社会重要成员的姿态与北美、西欧共铸“三足鼎立”的局面,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已占主流。

在东北亚,美、中、俄三大国是地区形势稳定的决定力量。中俄关系的走向成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1995年以来,中俄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我签署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边境地域裁减武装力量的协定,不仅标志着延续近30年的中国与前苏联、蒙古8900公里边界线军事对峙的解除,而且使该地区整体形势的缓和与稳定有了大前提。中俄两国内部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与改革的不可逆转性,特别是俄西部有北约集团压力,我东侧有美、日、韩联盟的掣肘,决定着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必要性和长期性,也决定着这一地区的安全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现实可靠的基础和主体稳定的态势。而另一方面,东北亚是美国驻军最多的区域,其亚洲10万驻军的82.5%驻扎在韩国和日本。其驻军的目的一是支持美国向这一地区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二是在发生危机和冲突时及时做出反应和保护美国的利益及公民的安全;三是对可能在利益上与美国对立或冲突的国家实行遏制。由于美国仍是冷战后的超级大国,其主宰全球不允许任何国家对其利益提出挑战的霸权主义心态和在任何地区均应获取最大利益的信条,以及敌视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冷战思维,决定着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政策将建立在介入—控制—遏制的的基础之上。为此,美国将以其与日本、韩国签订的安保条约为基础,力图组成其冷战后主导东北亚安全局势的链环,既可控制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又能形成对我国与俄罗斯的遏制,这将是对我发展的最大威胁因素。日本政治上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对本国利益的关注超过对原有的集团利益的关注,对美国的政策和其在本土的驻军产生一定的抵触;另一方面,日本对中、俄大国的戒备心理和欲争地区之强的意图,以及对朝鲜国内政局走向的担忧,使其仍需借助美国势力,作为安全防御之盾和利益扩展之矛。这种政治上的两面性和日本国内右倾势力抬头,对华消极因素逐渐增多,可能成为我未来安全中的隐患。

在东南亚,冷战后这一地区出现了正负影响共存的

特点:一方面,迅速发展的经济对亚太和平与发展注入活力,各国发展的共同点增多,保证了地区安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但使一些亚太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矛盾得到缓解,也使各国间的合作和交往进一步增强,对地区性危机的出现或升级起着抑制作用。有关国家间存在的领土、海权问题都在谈判解决之中或处于搁置状态。另一方面,地区内国家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地区内各国的利益摩擦和碰撞,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大国介入与争夺的加剧,又导致地区潜在性危机增多。表现在南海主权问题分歧加剧;地区内出现军备竞赛的趋势等。但从目前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态势看,在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前1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亚太地区内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使东南亚地区交错上升的两种力量中和平的力量仍将处于主导地位。中国、东盟与美国是这一区域安全形势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内部情况不同,未来在东南亚地区可能爆发的冲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暴乱。但暴乱通常只限于本国境内,把邻国拖进去的可能性很小。另一种是国与国之间领土(海)争端。这种争端的存在有可能使东南亚地区未来的安全出现十分严峻的局面。

## 1997年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特点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郭新宁

1997年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发展较为平稳,呈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保持了冷战结束后走向缓和的势头,各次区域安全形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东北亚形势有所改观,朝鲜政权交接顺利完成,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粮荒在朝鲜人民的努力及国际社会的支援下得到缓解,南北僵局稍有松动,酝酿已久的四方会谈于8月和9月先后进行了二次预备会议。尽管有关各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较大差距,但对四方会谈的主要议题即建立和平机制都无异议。因此只要各方本着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真诚的对话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新的和平机制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在南亚,长期影响印度次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印巴关系开始解冻。5月12日印巴两国总理在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时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谈,一致同意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在两国总理授意下,两国外交秘书于6月举行会谈,讨论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同意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磋商,并愿把50年来因克什米尔问题造成的对立搁置一边。这为南亚这个不稳定地区走向缓和迈出坚实的一步。在东南亚,虽然柬埔寨内部冲突和波及该地区的金融危机带来一定冲击,但是

东盟的再次扩大将除柬埔寨以外的整个东南亚连成一片,为本地区的合作、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大国关系调整力度增强,有可能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架构。亚太地区大国首脑外交十分活跃。江主席4月访俄,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预示着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合作将进一步加强。11月叶利钦总统访华,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10月底江主席成功地访问了美国,两国领导人就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这将有助于中美关系这个被公认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建立在稳定与合作的基础之上。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对中国的访问及李鹏总理11月对日本的访问有助于使近年来麻烦不断的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为确立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奠定基础。11月初叶利钦总统与桥本首相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进行了会谈,双方保证在2000年缔结一项和平条约。可以肯定,经过冷战后的调整,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基础将逐步走向稳定。

第三、多层次、多渠道的多边安全合作与对话向纵深发展。本地区最重要的多边协商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经过成员国几年来的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目前论坛已开始酝酿是否由第一阶段即建立信任措施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即预防性外交阶段。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多边安全合作与对话也在不断发展。这种多层次、多渠道的多边安全合作与对话的深入发展无疑有助于亚太地区各国之间加强相互了解、建立互信关系,也有助于本地区进一步走向和平与稳定。

但是本地区安全形势也还存在一些暗流,有可能影响地区未来安全形势。一是一些国家坚持冷战思维,仍然试图以强化军事联盟的手段增强自身安全,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二是本地区一些热点问题仍未解决;三是“逆裁军”现象还很突出。这些问题无疑是未来亚太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 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 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吴献斌

1997年9月23日公布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原来的日美安保体制相比较具有如下重大变化:首先,针对的国家(假想敌)由原来的苏联变成了中国和朝鲜。其次,日本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由原来的被保护变为与美国一道主动出击(由盾变为矛)。“新指针”明确规定了日本在“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要与美国一起实施包括搜集情报、扫雷、补给、以致强行登临检查、海上

封锁等在内的内容广泛的合作,使两国军事合作的力度出现了质变。第三,防卫合作的范围扩大。1960年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两国联合防卫的地区严格限制在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200海里之内及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1978年改为“远东”,但日本政府特别声明:“远东”不包括中国和朝鲜。这次调整则扩大到了亚太地区。1997年4月10日桥本对自民党议员表示:日美防卫合作范围将扩至台湾和南沙群岛。

“新指针”的这些变化对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统一大业具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第一,助长了台独势力的气焰。“新指针”的出笼无疑会使台独势力更受到鼓舞。因此“新指针”促使台湾局势更趋复杂化的后果值得高度关注。第二,为中国的统一进程设置了新障碍。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中国政府对待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新指针”则对此提出了挑战,从而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统一手段的选择空间。如果中国政府以非和平的方式遏止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和实现统一,日本就会借口在其“周边地区”发生了“紧急事态”而联合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这样“新指针”就与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一道,形成了中国统一的双重障碍,使中国在推进统一的过程中不得不应付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力量的明确阻挠,从而大大增加了统一的难度。

## 日本共产党能否东山再起

中国社科院 蒋立峰  
日本所研究员

总起来看,日本的1997年是平稳的一年。然而,在此平稳背景下,日本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却颇为迅速,集中了人们的注意力。在一部分日本国民的头脑里,甚至已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共产党能否东山再起?

### 一、日本共产党的现状

日本共产党在60年代曾达到最盛期,70年代以后遭受打击,尤其80年代末期以来,因国际形势出现的巨大变化,在所谓“体制选择论”(即“要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压迫下,实力大减,不得不采取守势,但在近两三年里,它的势力有较快恢复。1995年经过参议员选举,其议席由5席增至8席,在统一地方选举中取得了压倒自民党的战果,成为地方议会的第一大党,目前其拥有的地方议员超过4000人,在66个地方政权中成为单独或参加执政党。1996年经过大选,其在众议院议席由15席增至26席。1997年7月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又获大胜,其议席由13席增至26席,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日本共产党现有26000个支部,37万党员,《赤

# 1997 年国际政治形势研讨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 高 华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1997 年国际政治形势具有哪些显著特点? 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出何种态势? 金融在国际经济安全中的影响和作用是什么? 如何看待世界多极化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接触与遏制等问题? 1997 年 11 月 7 日, 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和国际政治研究室主办的“1997 年国际政治形势年终研讨会”, 就上述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中联部、新华社、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国际部、光明日报国际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其他国际问题研究所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 各自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角度作了专题发言。现将研讨会的重点议题综述如下。

## 一、国际政治形势总特点

专家们认为把 1997 年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概括为: 总体保持缓和势头, 大国关系继续调整, 冷战思维

能》报发行 50 万份, 星期日版发行量达 200 万份。鉴于这一发展状况, 日共中央提出, 本世纪内党员人数要增加一倍, 《赤旗》报读者增加一半, 进入 21 世纪后, 经过数次选举, 在国会拥有众议员超过 100 人, 参议员达到几十人, 形成自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体制, 并为尽早实现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

### 二、日共势力发展的原因

日本共产党势力近年得到较快恢复,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 在 1993 年后日本政治“总体自民党化”的潮流中, 它没有像社会党那样与自民党代表的保守势力同流合污, 而坚持了总体政策的独立自主性, 但在阶段性政策、具体政策上又作出适时调整, 提出“目前不要求社会主义, 而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改革”、“国民是国家主人”等口号以争取国民支持; 其二, 与日本的其他主要政党相比, 其运作系统严密, 基层组织有力, 依靠党费每年有 300 亿日元支持, 在日本国民政治意识日渐淡漠、投票率低下情形下, 能保持稳定的支持力量, 并拉过来一部分自民党的支持势力支持自己; 其三, 自民党对经济不景气回天乏术, 其他保守政党均处于不稳定时期, 影响力日减; 其四, 日本国民希望有一个能与自民党对立的党存在以适度制约自民党, 在今后一个时期内, 只有共产党有可

严重存在, 霸权主义屡遭挫败, 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矛盾仍然复杂多变。这也是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北约东扩, 美日安保体制西扩, 中美、俄日关系明显改善, 香港回归, 中国力量迅速上升, 是今年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几件大事, 它体现出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和国际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透视今年国际政治形势的特点, 是与会者研讨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冷战结束后悄然展开的地缘政治角逐在 1997 年格外引人注目, 它遍及整个欧亚大陆及其边缘地带, 几乎将各大力量都卷入进去, 其中两大焦点是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体制西扩。两者本为冷战时代的产物, 现在突破了原有结构框架, 前者跨越了原集团政治的地理范围, 后者则超出“双边范围”, 涵盖住亚太地区三大热点。两者的联动效应在于: 第一, 外围或边缘地带将再现逼向“大陆心脏地带”的压迫之势, 使俄中两大国接近成为客观的必然。第二, 东扩和西扩重点烘托出美、俄、中三者关系的重心转移将牵引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的转移, 从而对国际关系整体结构产生致命的

能做到这一点; 其五, 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其势力的恢复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

### 三、日共势力的发展前景

如果今后世界形势仍然以和平发展为主题, 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进一步降低, 日本的国民经济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恢复, 日本共产党的政策更加鲜明化(反对修改宪法、反对日美军事同盟等)、大众化(反对自民党的经济政策、尤其反对增收消费税)、柔软化(与其他带有革新意义的政党尽可能谋求共识), 则日本共产党的势力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日本共产党东山再起”是指其势力恢复到 60、70 年代的水平, 甚至具有与自民党相对抗的实力, 则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日本共产党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至于实现日共主张的民主联合政府, 从日本政党势力的发展趋势看, 保守政党之间虽然矛盾重重, 但整体实力十分强大, 社民党等原革新政党已大部失去革新性, 主动回头与共产党联合的可能性很小, 只有当日本政界经过分化改组又出现了新的势力较强大的革新政党, 日本共产党并能与之在妥协中求得一致时, 才有可能面临实现联合政府的机遇。当然, 这决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一蹴而就的事。